

# 记忆极深的九件事情

By @李仲武

**摘要：**以下部分是作者对童年时期那些有极深印象的人事物的简要描述和总结，共分为九个部分：“家庭合照”、“小学乡里考试”、“一道计算题”、“电灯泡和马叉事件”、“我的老屋”、“夜间醒来”、“计划生育”、“外婆家的暑假”、“农村的吵架”。从这些生活的细小片段，可以感受到作者对童年生活的爱与恨、忍耐与反抗等相互矛盾的内心情绪，进而反映出了当下的作者对过去那些事件的“新”看法。

**关键词：**童年时期，农村社会，农村教育，农村村民

## 一、家庭合照

我家那个唯一的木制长方形相框，是母亲在订制“凉板床”的过程中，用节省的木料请求木匠制作而成的。母亲把原本分散开来的一叠叠相片，按照主次分明的顺序摆放到了这个大相框里，再用一圈又一圈的胶布将相片牢牢地固定在透明玻璃上，然后就是我们围观着母亲把这个他精心设计的作品展示在众人跟前。每每有亲人朋友或者乡里邻居前来家里拜访，母亲总是会远远地向他们介绍那些照片背后的人和事，而处于相框中心位置的那些照片里的人物——我的哥哥和我，就自然地成为了母亲跟众人讲述的故事里的“主角”。不过，对我而言，有一张位于一个不太起眼的位置上的“镇框相片”，却

一直并且始终是我们家庭在“九十年代”里的最灵魂载体。尽管到了“新世纪”，我们家庭成员大部分都有数码甚至单反相机了，可是，这张由那些专门下乡通过拍照收费的“胶卷相机”师傅所拍摄的“家庭全员照”，却成为了直到此刻为止家里唯一的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家庭照”。当拍摄那张照片的时候，那颗正直壮年的大梨树仍然挂着数不胜数的果子，而且“农民工”迁徙务工概念在村子里还并不流行，手机、网络、快递等带有“现代气息”的名词压根儿就陌生得不能再陌生。我依然清晰地记得，在那时候，家里的全部收入来自于父亲的“石匠手艺”和母亲的“农耕劳作”，不过也依然只能勉强与我们高额的小学学费做一个“收支相抵”。那时候土地联产承包已经成为了事实，父母在分得不多的田地里进行精耕细作，可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大量且昂贵的生产资料投入，往往成为了严重阻碍农业产量提高的约束因素。总而言之，在农业生产方面，当我们缴纳了国家税费和征购后，留存下来的粮食可能需要通过精心安排使用，否则，“青黄不济”就会成为很多农村家庭的真实写照。可就是在那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家里的全体成员都穿着最新的衣服，不断搓洗了头发和脸部后还涂上了母亲用的“香香”（一种护肤的东西），精心设计了可能在当时被认为最潮流的“发型”。通过商议把照片的背景选定在了那颗现在可能已经为杂草取代了的“大梨树”前面后，大家按照长、幼、高、矮顺序站立着，当父亲/母亲将双手分别倚在哥哥/我的肩膀上，并在嘱托我们按照照相师傅交代的那样露齿一笑的瞬间，这张承载着太多回忆的老照片就在曲折中出生了。当时的那张照片并没有经过过胶处理，在春夏秋冬四季更替的过程中，很快，它就开始出现了褪色的迹象。为了保护这张来之不易的彩色家庭照片，母亲就将它送到乡上的照相馆进行处理，待街道处唯一的照相师傅忙了一大个上午后轮到这张照片时，母亲“估计”已经早早地站在一旁心急地观看着上胶过程，生怕照相师傅一不留神损伤了

它任何一丁点。照片里哥哥穿着的那件中山装，“听说”是当年父亲在他年轻的时候所穿过的最正统服装，而它也在我成长到哥哥那个年纪时，成为了当时我所穿过的最有派头服装。直到现在，母亲依然丝毫没有改变过，她在那张照片里所呈现的“短头发造型”，尽管她经历了那么多沧桑阅历。变化的是我们对人、事、物的不同层次看法，可不变的是那份具有年代感的回忆。

## 二、小学乡里考试

哥哥大我五个年头，因此，在我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他已经正式步入了初中阶段的学业。在九十年代，在“读书改变命运”的口号真正为村民所接受的背景下，村办小学变成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地方，几乎所有行政村的小孩都被送往村办小学学习。昂贵的学费确实把很多的家庭逼迫到了极度窘迫的地步，到报名的那一天，有些小孩或哭着、或闹着的场景就屡见不鲜了。在这些小学生六年级毕业后，他们不得不准备一个升学测试，因为在一个初中教育资源极端短缺的年代，受教育的权利就只能按照一定的规则分配给少部分学生了。哥哥一直认为他是聪明的，看起来，他就是那么自然地拿到了到乡里初中学习的资格证书，而且他确实也在初中前期阶段因成绩优异，而获得了全校该年级的“第十名”。教育部门作出了规定，村里的小学生需要到乡里参加每一学年的期末考试，而当时就读三年级的我，因为有在乡里参加寄宿制初中阶段学习的哥哥帮助，感觉到很有安全感和自豪感的。在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母亲就为我准备好了红领巾还有笔、纸张等，最重要的是豪爽地塞给我一叠一角的纸币，我硬是反反复复地数了一阵子这厚厚的一沓小票子。而等到考试的当天早晨，当天上依旧挂满了密密麻麻的星星，而公鸡仍然紧闭着双眼酣睡得时刻，母亲和我好像昨晚吃了什么兴奋剂似的，已经毫无睡意了。母亲匆匆为我做好早饭，同时兼顾着为做好猪食，就来到我身边，为我洗手、洗脸再系好红领巾，然后她就叮嘱我吃完早饭后记得揣着已经煮熟了的毛鸡蛋。母亲的工作很繁琐而且重复性很大，捡拾柴火、照顾庄稼、饲养家禽等等成为了她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家常事，而常年在其他村子经营“石匠手艺”的父亲只会在农忙时回家帮忙。农村的妇女大多比较勤劳，虽然没有女儿帮助母

亲经营家庭事务，但手脚利落的母亲经常会成为村子里主要的受表扬对象。这不，在我吃着母亲精心准备的早餐过程中，她已经乘着刚刚露出的天际银光快步走到了咱们那个丘陵“小盆地”的底部了。

待我锁好门（没有窗户）后，就沿着一条窄窄的小田埂来到不远的邻居家，与同一班级但“辈分”高些的何姓姑姑汇合。每次都没有出乎意料之外，她确实还躺在床上与夏季的起床气做苦苦的斗争，当她最终起床并用脸巾快速地抹了几下后，她就打算狠狠地宰一下对她千依百顺的奶奶了。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由于她爷爷是当时的村支部书记（这里没有任何其他暗指），她家是最早拥有彩电的户主之一了，所以，我也极度想去她家待上一会儿，而播放的“西游记”电视剧就是我最早知道的节目了。

在与她的奶奶讨价还价之后，她怀揣着可能数倍甚至十倍于我的“零用钱”出发了，只用了五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到达了当时的村小学与其他同学汇合。全班所有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沿着唯一一条通往乡里小、中学的小路抵达了哥哥读书的地方。哥哥知道当天我有一场考试，于是他就用两个饭盒蒸饭，在我们第一场考试结束后，他就在一个有犹如“万人窜动”场面的小操场里四处搜寻我的身影。

当哥哥找到我后（有时候，是我找到哥哥），他就带着我前往他住的那个由私人房屋改造而成的公共寝室。当打开饭盒时，我看到盒子里面有不少好喝的新鲜菜汤，在一个超短的时间里，我狼吞虎咽般地解决了这盒人生中的“第一份蒸饭”。后来方了解到，一勺子菜汤确实需要支付一毛钱，而哥哥当时一周的生活费是一元钱，所以哥哥就不得不多吃一顿咸菜拌饭了。事情还没有结束，饭后，哥哥又准备带着我去那个摆满小商品的操场，我也是狮子大开口，要这个、拿那个，于是，哥哥就支付这个商贩一毛，那个商贩一毛，最后囊中羞涩的他不得不多次几顿咸菜拌饭了。即使只吃着一份现在想起来难以接受的蒸饭，可那种有一个在这里上学的大哥所衍生的“自豪感”却足以让我优越很久。而很

多同班小伙伴，只能坐在操场的某个角落啃着“香脆面”，嚼着“豆腐皮”，喝着“冰糕水”，此时，我很清楚，曾经欺负我的那些小伙伴在这里不可能再在我面前叫嚣了，因为那是一个“强大武力”可以解决矛盾的时代。

### 三、一道计算题

在一个炎热的夏季，爷爷奶奶洗完澡后，就摆动着蒲扇在我们“大家庭”的三合院院子里吆喝着：“木马、板凳三十三，一百个脚脚地下翻”。我写作业的侧堂屋正对着他们，在一旁摆弄着小型黑白电视机的父亲似乎意识到什么，他盯着正在写作业的我，然后询问道：“从你爷爷奶奶那个题里，你算算有多少个木马和板凳？”我先是笑着应付道：“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不像是个应用题啊！”父亲可能觉得我不够用功作业，他瞬间将脸拉得直直的，严肃地答道：“如果你不算出来有多少木马和板凳，那你就不要吃这个晚饭了，吃了也是白吃！”兄弟俩可以说从小就对这位脾气“相对”暴躁的严父很有畏惧感，越是精神紧张、恐慌、幻想、惊吓，我越是不能将注意力锁定在解决这道在民间流传已久的算术题上。我还是仍不住哭了，并且哭得好伤心，哭得好无助，心想在“灶屋”（厨房）的母亲会出来袒护我而暂时中止计算这个题目，不过，她只是一边在和面，一边在重复着“木马和板凳三十三，有一百个脚脚，你看好多个木马和板凳嘛！”当时的我确实学习过加减乘除基本运算，就是没有学习过二元一次方程（这里也可以用一元一次方程），于是，我只能拼凑数字来对付旁边那位随时可能发飙的父亲，1、2、3、5、8等等一连串的数字都搬出来了。他真的是所谓的年轻人易动气，掴了我一个巴掌并声情并茂地训斥道：“你囊们这么傻哦，这么简单的计算题都算不出来，辛苦老子给你挣钱缴学费。”畏惧、畏惧，除了畏惧，就是畏惧，我当时只想挨过去那一晚上，一个漫长得分分钟可以让人窒息的晚上，我想要自由的空气和环境，自然又只能嚎啕大哭以示哀求，可这位严父声色丝毫未动，他用那特有的严厉眼神扫射着我的思维和胸膛。爷爷奶奶见状后就走到我和父亲的跟前，奶奶带着责备口吻的语气说道：“谁叫你个老不死的，在今晚上突然心血来潮，弄这么一个怪题，硬

是让我孙子哭得伤心得不得了？”扑通一下，窜进这个具有慈善心肠的老人怀里，终于知道有一个人能够在我危机时刻解救我。二爹在他屋跟前笑着唠叨了几句：“你看嘛，木马三个脚，而板凳有四个脚，木马和板凳总共有三十三三个，而他们的脚加起来有一百个，你看有多少个木马，又有多少个板凳？”

还是乱猜着，不过，我最后还是在二爹的提示下，总算凑弄了这个题里所说的木马和板凳的数目量。

小时候的学习，更多时候是在严父监督下被动完成的，别人玩耍的时候，我们兄弟俩只能做一个“身在曹营，心在蜀”的学习木偶。我们俩人跪在板凳上写作业，当父亲跳着水去灌溉庄稼时，我们就坐下来说话、玩耍了，并且时不时地做一个侦探去获取父亲最新的动向，而等到他回来查看我们表现的时刻，我们已经准备完全提前完成接受检查的准备工作。哥哥在初中阶段由于与其他同学玩扑克而学业表现欠佳，当父亲要求他去乡学校领取该学期通知书时，他因害怕暴露学业方面的糟糕真相，就拒绝了父亲的这个看起来很自然的要求。那时候的父亲依然正处于壮年期，他觉得自己辛苦在外干体力活儿赚取的学费，应当为他带来一纸写着良好评语的学期通知书的。在哥哥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后，父亲是大发雷霆，要求哥哥将那扇已经遭到反锁的门打开。可是哥哥跟我一样，很是畏惧这位严父的，他不敢打开那扇能够让他暂时安全的房门，几经周旋后，怒火不减的他硬是将门劈开踏着破裂的门板奔赴屋里。一场实力相差极度悬殊的“父与子”之间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谁对谁错不重要，反正他认为：“子不教，父之过；子不打，不成器”。直到现在，我依然不太认同父亲的这种教育方式，因为总是用强权和武力去胁迫他人同意没有经过协商的游戏法则。不过话说回来，自从高中起，我就深深地爱上了数学类课程，而且一直是自己的优势学科。



## 四、电灯泡和马叉事件

妈妈在灶屋（厨房）后面的柴房里取些柴火，在很是小心翼翼地挪动着一大捆干柴的过程中，却不小心打落了旁边的一颗灯泡。由于灯泡在当时是“相对”昂贵的商品，它可能会花掉父亲半天工作所赚取的工钱（60瓦的灯泡），所以故意或无意摔坏灯泡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了。父亲晚上手工回到家里，发现灯泡坏掉了，下意识地怀疑对象锁定成我，并且准备再一次用他那种没有规则的权力来教训我。母亲说灯泡是她去柴火不小心弄坏的，然后父亲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一样，在下次赶集的时候，他带回来了一颗新的灯泡并嘱托我们不要弄坏了。可事情就是这么巧，我在一次拉开关的过程中，把灯泡给闪坏掉了，当时确实是非人为原因的事故出现了。当天父亲照样手工回来后，得知灯泡坏掉了，当母亲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时候，劳累的他还是对我一顿暴揍以解他心头之气。无论我怎么陈述这件事情的非人为性，他就是只相信他的直觉判断——这个孩子一定在编造故事来推卸过错。皮肉之苦实在痛彻心扉，我就哭诉：“为什么大人做错了事，不需要挨打；而小孩做错了事，却需要挨打？”“同样是灯泡非人为原因的失灵事故，为什么大人就可以也必须无条件相信，而对小孩就不分青红皂白一阵痛打？”这就是我对威权主义的第一次挑战，因为制定规则的相关方不能够对遵守规则的另一方肆意摆弄，在规则之下的所有群体都必须一样公平对待。

高三放暑假期间，夏天的早晨是很凉快的，于是，务工返家的父母就决定挑选几颗好树，为来年的新混凝土结构房屋做好木料准备。那时候十七岁的我，其实是可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可偏偏让父亲选来干一些超过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不愿做或者做不好都必须接受他的斥责（此时，他已经不进

行体罚了)。在我家的湾里有一大片青葱苍劲的柏树林，他们又高又大且水分十足，父亲看好了其中一颗得有二百到三百斤的柏树。在我们合力将这颗柏树给锯倒后，他叫我和他一起把这颗柏树抬回家，尽管他承受了这颗重柏的绝大部分重量，可身体尚未发育完全的少年硬是扛不了这个被分担到有一百多斤的负荷。我直叫道：“这太重了，我尽力了”，父亲见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忙抬这树木，硬是强制要求我必须把它抬回去。这次我真的反抗了，我把马叉在地上用劲一摔，当再拿起来一看的时候，我发现马叉已经摔断了，幸运地是，父亲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后来母亲前来帮忙，我们才以三人互换的方式把这颗柏树给搬回家，母亲也发现了摔坏的马叉，不过大家都还算心平气和地面对了这个。父亲其实一直都很辛苦，他只不过是这个转型社会中微不足道的一份子，为了孩子在未来社会中有立足之地，他总是表现的很严厉、很严格、很具有威权性，不过很多时候做得过火就到了另一个层面了。现在的父亲要温和和民主很多，因为他也知道，如果再不讲原则的威权主义作风，将不能够约束我这支已经脱离鸟笼的“雄鹰“(暂且自认为雄鹰)。

## 五、我的老屋

在没有新建混凝土砖结构房屋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住在一个由四户人家组成的三合院里，那是典型的中国农村社会由家庭关系衍生出的住房结构安排。这个三合院是由爷爷奶奶带领父亲、二爹、幺爹等家庭所有成员集体修建的，然后根据抓阄的规则来分配住房的位置，而由哥哥抓取的西边一块就成为了我居住了近十八年的“老屋”。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有四间房屋，分别是灶屋（厨房）、堂屋（客厅）、歇房屋 1 和 2（卧室），我和哥哥就小时候就睡在那间最凉快且最大的歇房屋 2。后来鉴于房屋空间相对局限方面的考虑，父亲邀请小姨夫的父亲用竹子在堂屋和歇房屋 1 上面隔了两个新空间，而歇房屋 1 上的那个相对封闭的楼层就成为了我和哥哥的新住所。那时候，我们透过“亮瓦”（一种透明的瓦）可以看到外面的月亮，而早上起床的时候总可以第一时间享受阳光的沐浴，感受着新鲜空气透过瓦片涌入了我们这个可以宣称产权的私人空间。当我们把上楼的梯子移到楼上，然后就没有人能够轻易地进入那个领地了，从小就被父母严厉管教的孩子终于有了被解放的兴奋。我把家里的小圆桌搬到靠近睡床跟前，不用开灯也能够靠着外面的光读读书、写写字（不是练字），再带着一个水瓶和一个茶杯、一包茶叶，渴了就冲上一杯热气腾腾的开水（茶）。那就是第一次感受到专属于自己所有的“产权”，外面的那道小门就自然地成为了我们划定权利归属的界限。不过，由于我们西边那块距离爷爷奶奶住处比较远，所以当我在小学五年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留守儿童”时，我很自然地选择与他们住在一起，或者叫奶奶过我家房屋那边歇息。那时候整个中国还是相对不富裕，在我们村子里经常会发生偷窃事件，而我家也在意料之中成为了受害方之一。“贼娃子”（偷窃者）想方设法进入我家堂屋，然后爬上我曾经住的那个楼层，然后再凿一个洞，再一次下赴到歇房屋 1（父

母曾经居住的卧室)，最终将刚掉的棉絮、厨房电器等物品搬走了。那时候，尤其在凌晨三、四点，那些偷窃者会潜进他们留意很久的人家屋内，偷窃家禽、粮食、衣服、树木、蔬菜、水果等可以服务于吃穿住用行的物品。经常听闻大人们在家里讲这方面的恐怖新闻，胆子越来越小了，深怕在半夜的时候有一个人将熟睡的自己挪走了，然后贩卖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成为了奴隶或者被摘取器官。在我们村子里，那时候有很多的人贩子，他们往往形成了一个交易联络网络，专门针对那些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偷窃得手后就贩卖到外省去从而获得中间的高额血色佣金。小时候的想法，就是要把那些已经为村里人所知道的人贩子铲除，并把他们送到司法系统接受应有的惩罚，尽管他们都已经金盆洗手撒手不干了。上面提到的老屋已经拆掉八个年头了，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它就在一阵阵挖掘机轰隆声中瞬间化为废墟，这是我今生的遗憾和痛。现在很多家庭都盖上了钢筋混凝土砖房，不过，那个承载着太多关于“过去的故事”的老瓦房却让人难以忘却。

## 六、夜间醒来

在初中阶段的某个深夜，已经受到来自同寝室同学皮肤疾病感染的我，瘙痒难忍也更是无法入睡而始终处于醒目的状态。那时候，我们很多人挤在一个隔成了两间的小寝室里，这导致其他学生的皮肤病很容易通过棉被接触而感染到另一些学生。我们住的那间寝室位于学校的一个极偏僻角落，而窗户外面就是乡街道的人家安葬其祖先的地方，听说连学校都是建在“乱葬岗”上的。当大家都在熟睡中的时候，我却因瘙痒难以入睡，窗外传来的是一阵又一针的“法事”（对去世的祖先超度啥的），这让我又不敢起床到外面上厕所。一边是奇痒难忍的痛，另一边却是阴阳怪气的锣鼓声，我打算起来让身体凉快一下来减轻痒的程度，但是一出去就能够看到那家灯火通明的“阴事”发生地。在左思右想之后，我决定还是不要起来了，就这样看着窗外的月光，强忍着进入了梦境，在第二天，我就前往医生处捡药对其进行根治。那时候，村里人受教育水平相当有限，人们对迷信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凡是通过药物根治不好的疾病，他们都会尝试“巫术”这套迷信体系。“搞封建”、“搞迷信”的市场在当地很大，“师娘子”（据说，她是能够与神进行对话的使者）会通过灵魂出窍的方式来连接人与神，人神对话的场景那是相当精彩和出色，只不过我每次都有笑出声。我的隔房大爷就是一个“搞封建”的，他会免费地帮助他人进行非科学方面的诊断，不过，他始终无法挽留那些因疾病缠绕而不得不辞世的病者。在初中的早晨，天一刚刚放亮，全校所有学生和值周老师就不得不在操场集合，开始沿着乡街道和公路的晨跑训练。可有一天早晨，当我们跑到乡街道旁边的一户人家时，所有学生都在议论一件事情，这户人家的男主人因为喝蝌蚪而中毒身亡（他误信蝌蚪可以治疗某类疾病）。按照当地风俗，出葬需要敲定吉利日子，因此这户人家就只能一直将棺木搁置在家门口，并且点着油灯和烧着火纸。

小学生们个个都显得很畏惧，毕竟接受的科学知识有限得不能再有限，所以，他们都远远地绕开这家门口并且蒙着眼睛快步逃离。自打进入高中阶段，由于从乡里到镇上的高中只有一辆班车运营，为了早早地获得一个稀缺的座位而不至于挤得不知所以然，我约定同村另一个小伙伴一起打着手电筒从村里走到乡里。可是，我每次都需要早早地从我家出发，一个人打着手电筒，步行一段还不算太近的上坡路，并最终抵达他家去等他一起出发去乡里。在这段一个人月色下的独行路途上，我当时心里就默念着：“God,Bless me!” 关键是他那慈祥的奶奶去世几天后，我也还不得不一个人走在看不到前方的路上。这样的经历，一直持续到高三期末，尽管当时心理有万千的“拒绝”，但生活迫使我们不得不独自面对前进路途上他人给你灌输的“妖言”。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邪恶和不正之气，偷窃、打劫、绑架、强奸、拐骗、封建、迷信等等往往成为了坏人控制社会的工具，如果我们愿意多读几本书，多看几部科学纪录片，那我们就能够战胜那些来自无知群体的不必要恐吓（你父母可能就是那部分无知的群体）。

## 七、计划生育

我的出生本身就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幸运”，因为，当时的“计划生育”这个违背基本人权的国家政策在当地得到了极度严格的执行。小时候我就会无端地发问：“我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一些大人就会说，所有的小孩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而另一些大人就会说，所有的小孩都是从妈妈的腋窝里生出来的。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对于“性”的天然避讳，他们对于“性”忌讳很深的，凡是谈到哪怕是提及到“性”相关话题的人，就会被贴上不正儿八经的二流子那类标签了。“性”总是被当成了一个秘密的事情，连青年阶段的“梦遗”现象都会被家长们进行另类解释，传统的道德伦理对女性在“性”方面的管控及其森严，这间接让很多女性为了家族的荣誉而被抛弃或杀害。这不是一个文明社会应该出现的现象，“性”跟吃饭、睡觉、上厕所始终是一种生物自然现象，分别可以用生物学知识进行科学解读的理论，却让中国传统学院派从哲学、伦理学角度来了一通无法逻辑自洽的解读。在大学之前，我一直都不了解诸如“胚胎”、“子宫”、“避孕”等知识，经过一系列认知之后，当现在重新来看待人类时，我就只会认为人类其实就是一种哺乳动物而已。听外婆说过，当时母亲将要生产我的时候，正好遇到村里那些领导人员的突袭来访。在有人提前告知的情况下，母亲被转移到住在另一个村的外婆家里待产，最后是在外婆家里待了好一阵子之后才辗转到我们村里。由于我属于超生的人头，所以一直没有获得户口登记，“可能”直到读书的时候都是“黑户”了。那时候，一旦村里的领导团队得知某某家庭超生的消息，他们就会对其口头恐吓和威胁，要缴纳多少超生罚款等等，若没有资金缴纳该笔款项，他们就又是牵牛，又是赶猪，又是抓鸡的。如果这些超生家庭邀请他们喝一顿好酒，并且给他们封上几个红包的话，那他们就会当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尽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

宣传牌四处可见，但村子里几乎家家都有至少二个小孩，因为他们大都有关于“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方面的顾虑。而村子里的妇女等到第二个小孩生产之后，往往都会前往乡卫生所采取“节育措施”，不然再次怀孕的风险是很大很大的。从那时候起，很多村子里的村民就会对村里的基层官员展开“送礼大战”，目的就是能够方便以后在政策方面多倾斜一下他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时候缺衣少粮的缘故，等到小孩子一出生，家里人往往是用一些由旧衣服、裤子裁剪出“尿布”，平时就会把婴儿搁置在一个塞满谷草的背筐里。这个背筐就人为地被当作了摇篮，前后左右晃动这个大背篓就是在给婴儿摇摇篮，它也成为了大部分村里小孩从出生到可以爬走阶段的“家”。那时候的村子里的男壮年因为平时多在外村做手艺，就会选择一个月回一次家休整一番，而典型的满脸“络腮胡”就是那些小孩的“最怕”——他们把脸贴近小孩的脸庞，本来想好好爱抚一下长时间未见的孩子，却丝毫未能意识到那满脸的“硬”胡须扎得小孩不敢再次靠近。



## 八、外婆家的暑假

外婆的老伴去逝得相当早，听母亲说，那个有些暴躁的“老爷子”肺部患上了疾病。外婆不得不在中年阶段就挑起家里的担子，里面的个中辛酸落魄自然多得数不胜数，不过，她依然一步步抚养长大了她的七个子女，并且帮助他们都顺利地成家立业了。外婆是一个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市场受压迫的那批女性之一，在夫家就时不时地忍受着我们现在较为关切的“家暴”行为，在妯娌关系上也往往因为孤身一人而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地位。然而，这位老人显得就比较开明豁达了，她似乎从来不计较过失和输赢，真正地做到了任何事情在她面前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我也挺疑惑时常挂在她脸上的笑容，后来细细一想，一个从小就遭到不公平对待的女性，已经习惯了逆来顺受的面对法则，因为她知道反抗和对峙都不能让她的处境有所改变。她总是会一个人自言自语半天，不管在哪个角落，也不管在哪个场景，你总能够感觉到她似乎在与另一个人说着什么。她有时候也能跟母亲说上一个寒夜，母女俩围坐在火堆旁拉起家常里短，不过躺在床上睡觉的我，有时候却会隐隐约约听到丝丝的哭泣声。外婆总会对需要她的子女孙无条件付出，当舅舅生病了，她就四处去寻求帮助，上坡来、下坡去的路途狠狠地折腾了这位老人；而当她的孙子、孙女需要零用钱时，她都会心软并再心软地把散落在抽屉里的零碎钱交给他们，而她自己也知道下个月可能需要少吃斤盐巴了。当我在初中暑假跑到外婆家游玩时，她的孩子、孙子都去深圳等地务工了，所以只剩下这个可以被称为第一代的“留守老人”了。那时候外婆家里没有猪油了，她连菜籽油都需要向邻里借用，而我爷爷奶奶家却存着过去二年甚至三年的猪油，所以奶奶和我就打算给外婆带去一大捆猪油。至今印象深刻的是，每次外婆家的炒菜都带有浓浓的菜籽油味道，非常清淡寡味，我直言不想吃这个炒菜了。当我带去这捆有些年头的腊猪油时，

外婆总是精打细算着怎么最大化利用好它，最后决定将这些猪油与她借来的菜籽油混合起来制作成“菜籽猪油”。既然名字是“菜籽猪油”，那可想而知的是，菜籽油的比例是远远胜过猪油的比例，这种混合油的味道是涩涩的但却香到心头了。在外婆家的那个暑假，生活很规律，早晨起床就看见已经准备好的饭菜，中午就帮助外婆搓包谷（玉米），午饭后有一小段午休时间，下午就是外婆带我走家串户的重要时刻。在那个暑假里，我第一次看到了“皮蛋”，那可还是外婆用四毛钱给从柯家买回来的，可还没等吃到一半的时候，就哇哇地吐掉了口中所有的咀嚼物。在外婆家的时间，我不用像在爷爷奶奶家那样被强迫去干农活，外婆从来没有要求过我去农地里做过什么，她总是说我是应该好好休息得“小客人”。这就是所有外孙极度希望到外婆家过暑假的原因，外婆意识里从来没有“强制要求”这个威权概念，她有的始终是“宁愿自己多动一下，不要委屈了我的外孙”想法。每天晚上洗完澡后，外婆就会在灶屋（厨房）做晚饭，而我就会在她的院子里开展一件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的事情。打开院子里的“路灯”，我就开始了我的“京剧”独唱表演了，而我的观众就是那些住在我外婆家对面的村民。至于是不是“京剧”存有很大的疑问，不过我是在很用功地独唱自己随口编造的段子。在空旷的河沟坝子里，整个寂静的夜晚就只有我这自以为是的“喧闹声”了，但外婆丝毫不介意别人说“闲话”（闲言恶语），还经常问我：“你唱的是什么艺术形式？”现在回想一下，当时的我简直是太过大胆无视他人了，这可能是一“留守儿童”驱赶孤寂的一种方式，也可能是我一直想向他人证明“我是存在的”。外婆现在成为了真正的孤寡老人了，我每次春节回家都会去看望她，还硬要要求她前往我家里待上个半个月到一个月时间，叫母亲做最好吃的饭菜给她。可自从上次家里的奶奶失命于“脑梗塞”之后，在春节过后的正月初她就让父亲给早早地送走了，我的外婆就再也没有来过我家玩耍了。这几

年父亲母亲甚至我们全家都在外地，所以母亲只能够通过电话慰问、关切这位已年过八旬的老人，有时候就会一次性地给她汇一些零用钱。小农意识在我们村子里很盛行，一个个村民为了“蝇头小利”就会大打出手，父母情、兄弟情、姊妹情等都可能拜倒给无其不忘的“利益”，所以“吵架”、“打架”场景会时不时的在村子里上演。外婆很少与他人争论，可能是她不知道怎么驳倒对方，也可能是她根本打算与对手辩论一些不存在的事实。村里的信息流通渠道是很扭曲的，这往往导致了“谣言”的肆意侵入，村民你一口，我一口地传递一些不断被歪曲的情节，使得整个村子经常会为这些事情炸开锅。不过外婆就不打算踏进这块是非之地，管它谣言如何生产、传播、进化，她始终闭口不谈而一笑而过罢了。外婆是一位社会底层的女性，是一位我难以全面认识的老人，但她的命运却始终难以脱离当时中国整个大环境，她的所思、所想、所为、所行都是社会压迫的结果。

## 九、农村的吵架

越是在一个封闭静态的区域中，越是在物资极度稀缺的经济体系里，人们就会越来越显现作为哺乳动物的“自私”本性。在一个穷苦落后的土壤里，高大上的精神文化追求往往是虚幻而不切实际的，人们只会一股劲地追寻实实在在的“利益”。教育可以教化人们的头脑，但很难教化人们潜意识中的那股“私欲”，这就是经济学最核心的假设。在九十年代初期，我们村子里的村民很少有人外出务工的，大家都是心灵手巧的手艺人，有石匠、篾匠、吐匠、发匠等职业。农村也算是一个分工较为明确，且较有协作体系的小型独立经济系统，不过劳动报酬往往都只能在十元到二十元的低位区间运行。那时候的我们家庭确实不用担心“吃饭问题”，不过任凭勤劳的母亲怎么用心饲养“肥猪”，那些“年猪”都显得很骨干和娇弱。有时候，我们家宰了二头“年猪”，可有精细筹划能力的母亲也不得不好好支出这些腊肉，否则青黄不济的尴尬阵风就会突然袭来。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时只有几岁的我，确实确实见证了贫瘠的中国农村所发生的件件辛酸事。我的母亲就与我的奶奶和我的二娘有过数次争吵，并且都是因为一些芝麻大的小事，她们随时准备着一场持续几小时的“吵架拉锯战”。她们的吵架不讲究证据，更不讲究逻辑，反正谁的音量大且尖，谁的用词更狠更辛辣，谁能够不吃饭而坚持战役，谁就能够成为该次消耗战的绝对胜者。而其他周围的邻里往往都选择火上浇油，凑上来为她们各自的战队加油打气，俨然有将一场小规模战役扩展成为全村人加入的大型对抗战。当时村里没有什么集体活动，大家往往都是在每个月的2号、5号、8号、12号、15号、18号、22号、25号、28号前往乡集市参加交易的过程中碰碰面，所以村民的生活就确实比较单一和令人厌倦了。当时我就暗自明白，这所有的农村不和谐因素，都是因为村民的贫苦，都是因为农村经济的凋零，都是因为中国

政府的不作为而造成的。暴力现象更是屡见不鲜，丈夫对妻子有家暴行为，父母对子女有家暴行为，邻里之间时常闹出人命，偷鸡摸狗、坑蒙拐骗极端盛行。我也有受到这个氛围的影响，对别人也有爆过粗口，也有想着偷偷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过这些事情都随着“人们走出去观世界”的选择而不复存在了。如果人人都有吃、有穿、有住、有用，那怎么会有坑蒙拐骗的非道德、非法律行为出现？

如果一个社会层级是固化而难以迁移，那穷人就只能世代做穷人，那他们就必然想要改变这个系统，而这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拿走不属于自己的所有物。在中国变迁的这几十年里，每一个个体都先天的犯下了原罪，而国家是让人人成为罪犯的始作俑者，不过我们也需要暂且原谅制度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大、小失误。就像我现在的“大家庭”在一起生活得相当融洽，更何况母亲、二娘、幺娘她们妯娌之间可能只有在古稀之年才会再次相聚。每个人都希望能够与周围群体有友好关系，但是文化冲突、传统相左、思想矛盾等依然会激化彼此间的利益争端，这时候对公平、公正、公开的法律体系的要求就会显得紧迫。